

博

士



中国人民大学
博士文库

中国青年党 在大陆 和台湾

周淑真 著

文

庫

(京) 新登字156号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文库
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
周淑真 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发行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39号 邮码 100872)
印刷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毫米32开
字 数：218 000
印 张：9.875插页2
版 次：1993年11月第1版
印 次：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
册 数：1—2 000
书 号：ISBN7-300-01725-8/D·241
定 价：7.80元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文库》

2602/08 总序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文库》以反映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研究生的研究成果（博士论文），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促进我校科学的研究和教学活动，扶植学术新生力量为主要宗旨。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空前未有的宏伟艰巨的事业。为了使这一事业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顺利前进，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和掌握现代科学知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一个国家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应当清醒地看到，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实践相对照，当前的理论研究，还显得很不相称。对理论的冷淡和忽视，已经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不懂得现代科学知识，我们不但会在决策上发生这样那样的失误，甚至会使我们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迷失方向。因此，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用现代科学知识武装我们的头脑，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博士研究生，是中国人民大学最高层次的学位研究生，他们有坚实而宽广的基础理论，系统而深入的专业知识，有较高的理论造诣和较强的分析能力。他们的许多论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观点和方法，紧密结合实际，对有关课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同一课题或相关学科、相关专业的研究方面，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这些论文，不但在理论上具有科学性和开拓性，而且内容新颖、立论严谨，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文库》，由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科研处、出版社和书报资料社共同筹集出版基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文库》以每年答辩的博士论文为选题范围，筛选其中的优秀论文，逐年陆续编辑出版。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的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伟大的时代，正召唤着与其相适应的理论成果。广大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特别是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必将会对活跃和繁荣我国的理论研究，发挥重要的作用。当此《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文库》和读者见面的时候，我衷心地希望更多的博士研究生，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刻苦钻研，写出更多、更好的学位论文，有更多的人才脱颖而出，在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罗国杰

1988年10月

作 者 的 话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曾经产生过300多个大大小小的政党。它们之中有的顺应历史潮流，扭转乾坤，使它们的名字与中华民族的兴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决定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发展道路；有的则昙花一现，成为历史长河中泛起的泡沫。而中国青年党则介于两者之间，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青年知识分子分化的产物，建立于1923年12月，至今仍然存在于台湾，已有近70年的历史。这70年历史长河中，它总是不停地起伏，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曾留下或隐或显或浅或深的足迹。

客观地展现和剖析中国青年党的全部历史，给它以应有的历史地位，认识它在每一历史时期，尤其是历史转变关头的作用，以及它与各个政党、各个阶层的关系，这对于中国现代史、中国政党史和中国政治制度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中国青年党现在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的政治观点，采取相应的政策，为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同时给那些主张和鼓吹西方资产阶级多党政治的人以借鉴和启示，是我们研究其历史的目的。

对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的全部历史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是有一定难度的。政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代表一定阶级利益并服务于一定阶级的，因此，任何政党都有其阶级属性。是否敢于对中国青年党的阶级属性做一全面的符合历史实际的评定，是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人们习惯于把毛泽东于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关于国家主义派即中国青年

党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的论断，套用在中国青年党的各个历史时期。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关于国家主义派阶级属性的论断是符合实际的。因为中国青年党是为反苏反共而建立的，它的一切言论行动均以反苏反共为目的，并因反苏反共而反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联俄联共的国民党，反对国民革命，反对北伐战争。它的政治主张集中地体现了大地主阶级大买办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所以说，毛泽东关于国家主义派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的论断在那一历史时期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各个政党、各种政治力量必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调整其方针和行动。从中国青年党的全部历史看，应该说它是代表小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利益的。它与占统治地位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区别，有矛盾，有斗争；主张实行多党政治和民主宪政，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是它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抗战胜利以后的一段时间以至到台湾后的主要政治观点。另一方面，国家主义所具有的爱国反帝倾向，使它的主体能在九·一八事变后和抗日战争时期积极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虽然在抗战时期一部分党员叛国投敌，但那并不能代表其全党。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青年党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然而，就整个民族资产阶级而言，它具有两面性，既有反共反工农的一面，也有反帝反封建的一面。中国青年党在反共问题上却是坚决的，所以从它既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又坚决反共来看，它是代表小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利益的。

中国青年党的政纲也足以说明这一点。1930年8月制定的

《中国青年党政策大纲》主张：“承认私有财产权，但得以法律限制之”，“得以法律规定并限制人民之土地享有权”，反映了它既反对土地集中、固守于小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又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1945年12月制定的政纲规定：保障私有财产权，但须限制过分集中；工商矿业，以民营为原则，但关系国防及全体国民福利者，由国营和公营；保障民营企业的权利，国营企业不得与民营企业争利，并把生产技术的落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中国所特有的官僚资本主义列为中国社会中间阶级的共同敌人。这些都反映了它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中国青年党所追求的民主宪政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建立省、县议会等地方民意机关，认为在县、村中支配地方下层政治的是乡绅、地主，地方民意机关应以乡绅、地主为主体。因此说，中国青年党是小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政治代表，才比较地符合该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实际。

正是由于中国青年党阶级属性的多变性和复杂性，使它在旧中国基本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因反苏反共反国民革命而名噪一时，抗日战争胜利后因阶级关系的变化参加蒋介石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并跟随其到台湾，在政治舞台上呈现出衰竭的状态。但是在不光彩之中也有光彩的地方，它积极主张民主宪政，是国民党训政制度和一党专政的坚决反对者；九·一八事变后它曾单独开展过抗日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参与组织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现在在台湾坚持拥护祖国的和平统一，并坚决反对“台独”主张和活动，这些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间阶级进步性的表现。这种进步性

是它历经曲折坎坷而绵延不绝的主要原因所在。

中国青年党的全部历史资料尤其是到台湾后的历史资料的难以收集，也给研究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在这方面，作者用几年的心血，尽最大努力，收集和发掘了海峡两岸有关中国青年党在大陆时期的所有资料，并就所能见到的到台湾后的资料，勾勒了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的大概轮廓。对于中国青年党到台湾后历史的深入系统研究，还有待于海峡两岸学术文化的进一步交流。

尽管如此，作者自认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到了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一）关于五四运动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分化状况、少年中国学会与中国青年党关系的明确论述；

（二）对中国青年党的理论基础——国家主义所给予的深刻剖析、批判以及全面的科学评价；

（三）对中国青年党全部历史灰暗主色调的论述与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参加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开展民主宪政运动和反对“台独”活动的积极作用的论述与评价；

（四）对中国青年党参加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战胜利后恢复其固有的反苏反共立场的正确论述；

（五）对中国青年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具有的“抗日与降日并存、爱国与卖国同在”特点的概括和其主体是抗日、爱国的全面论述；

（六）对中国青年党与中国民主同盟关系的全面论述与剖析；

（七）对中国青年党到台湾后的全面分析和它是爱国统一战线争取对象的提出。

在这本论著即将问世之际，谨向我的指导教师彦奇教授表示由衷的感谢，并向关心这一书出版工作的专家学者表示深深的谢意。

目 录

作者的话	I
第一章 中国青年党的成立	1
第一节 少年中国学会及其分化	1
第二节 国家主义派的产生	24
第三节 巴黎建党	35
第二章 “醒狮”怒吼	50
第一节 《醒狮》周报的出版和国内组织的建立	50
第二节 反对和分裂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	60
第三节 依附北洋军阀，反对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	68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青年党的论争与冲突	77
第三章 惨淡经营	86
第一节 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	87
第二节 九一八事变后的政治主张和抗日活动	118
第三节 党务的停顿及其与国民党休战	132

第四章 两面适应与“三方布置”	151
第一节 抗战初期的政治主张和主要活动	152
第二节 在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中	162
第三节 组织和参加中国民主同盟	175
第四节 一部分党员参加汪伪政权	196
第五章 同蒋合流	201
第一节 与蒋介石国民党合作政策的确定	202
第二节 中国青年党与政治协商会议	213
第三节 参加“国民大会”和“国民政府”	227
第六章 风雨飘摇	251
第一节 到台湾后的组织状况与政治主张	251
第二节 如此“在野”	266
第三节 中国青年党与《自由中国》	277
第四节 海峡两岸关系缓和后的中国青年党	295

第一章

中国青年党的成立

第一节 少年中国学会及其分化

少年中国学会（以下简称“少中”）是五四时期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的各种社团中会员最多、分布最广、分化也最明显的一个社团。“少中”虽然不是中国青年党的前身，但它对中国青年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青年党成立于1923年12月，是在“少中”分化的基础上成立的。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青年知识分子政治分野的结果。

“少中”是由王光祈、李大钊、陈淯、周太玄、曾琦、张梦九、雷宝菁于1918年7月1日发起，至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的。1925年底因学会成员在政治上的严重分歧，组织上的严重分化而停止了活动。它拥有会员112人^①，他们都是忧国忧民的爱

^① 会员名单参见《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0—241页。

国的热血男儿，他们都同情或直接参加了五四运动。不少人从这里开始了他们的政治生涯，指点江山，扭转乾坤，在现代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了宏伟悲壮的历史剧目。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会员逐渐分化为三个部分：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赵世炎、高君宇、张闻天、杨贤江、黄日葵、沈泽民、侯绍裘、张申府、刘仁静等由爱国主义者转变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以后，他们组织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张梦九、何鲁之、魏时珍、彭云生、曹刍、刘泗英等由爱国主义者发展成为国家主义派，组织或参加了中国青年党。王光祈、周太玄、李勘人、宗白华、许德珩、周炳琳、田汉、郑伯奇、方东美、杨钟健、谢循初、朱自清、卢作孚、舒新城等则超然于党派之上，专心致志于学术研究或从事于教育事业，走上了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道路。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方面完全对立的两个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党，却都是从“少中”的分化中产生的。“少中”对现代政党的产生具有其他社团所不能比拟的影响。

“少中”的成立，经历过一个长时期的酝酿过程。正如它的主要组织者王光祈所说：“本会同人在本会未发起之前，大半先有一种精神上的结合，出处进退，互相商榷。”^①王光祈1892年出生于四川温江，1914年告别家乡，到北京任清史馆书记员，同年秋考入中国大学专门部法律本科，并兼做报馆的编辑。1918年

^① 王光祈：《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见《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三期。

7月以优异成绩毕业。王光祈在大学学习的4年正值国际国内风云变幻之时，他对中华民族的命运和祖国的前途深怀忧虑，常常感到窘迫无计，救国无门。由于新闻界的联系，他和当时在同一报馆工作的中学同学周太玄结识了在北京大学任教并主编《晨钟》副刊的李大钊，他们几度深谈，“彼此间很快契合”，“真是相见恨晚”^①。王光祈、周太玄、陈清与时在日本留学的中学同学曾琦、张梦九、雷宝菁经常通信。砥砺品行，切磋学问，并时常就国内外大事交换意见。大家都有为改变中国前途和命运共同奋斗的愿望和决心，所以在“少中”未筹备之前“已略具团体规模”^②。

“少中”是这样成立的：“首由北京会员王光祈君提出《吾党今后进行意见书》一册，……其时东京会员曾琦君等亦正有建设学会之计划，乃先派雷宝菁君归国接洽一切，同人意见遂归一致。”^③1918年5月，曾琦、张梦九等千余留日学生为抗议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与日本寺内内阁签订的卖国的《中日秘密军事协定》罢学回国到北京。经酝酿，1918年6月30日在北京南横街岳云别墅召开会议，商讨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到会者有陈清、张尚龄（梦九）、周无（太玄）、曾琦、雷宝菁、王光祈6人”。会议商定“由王君光祈草拟规约数十条，……并邀同李君大钊商榷一切”^④，同作为学会的发起者。曾琦在1918年7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午后润卿（光祈）、太玄来抄写少年中国学会

^① 周太玄：《关于参加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见《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539页。

^{②③} 王光祈：《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

^④ 同上。

章程，旋以电话邀李守常来寓，约渠加入学会，纵谈至晚，10点钟始去，甚相惬也。”所以当时列名发起者为以上7人。经过一年的筹备，“少中”于1919年7月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

五四运动时期是我国社会思想剧烈变革的时期，也是新旧思想冲突最尖锐的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促进了思想的启蒙，进而导致了青年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心。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北洋军阀政府的丧权辱国和对人民的残酷压榨，对资产阶级议会、宪法的肆意玩弄，以及各派军阀之间无休止的混战，把中国“弄得昏天黑地，不见天日”。正如张闻天在1921年8月分析“少中”成立动因时所说：“这种情形在稍有觉悟的青年看来，当然是不能（忍）耐的，于是鼓起他们的热血，想对现社会谋改革了。”^①他们要学19世纪“少年意大利党”创建“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党”创建“少年德意志”，以“少年中国学会”来创建一个“少年中国”。

当这些有志于改造中国的热血青年发起组织“少中”时，虽然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开始，封建专制观念的牢笼已被砸开，五四爱国运动已经爆发，但是他们面对纷沓而至的各种新思潮却仍眼花缭乱，他们的思想信仰尚未定型。因而“少中”提不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正如张闻天所分析的，“少中”“不是为了一定的、明了的一个目的而产生的”^②。他们只是在愤于现实社会黑暗，希冀从列强军阀交相侵逼的荆棘丛中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辟出一条血路，建立一个“灿烂、光华、雄健、文明”的“少年中国”方面具有认同感和迫切感。然而，

^{①②} 张闻天：《对少年中国学会的意见》，见《少年中国》第三卷第二期。

“少年中国”这个概念是十分模糊的，并没有内在质的规定性。“少年中国”究竟要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采用什么样的国体和政体，通过什么途径去建立理想中的“少年中国”？这些问题在成员中并没有一致的看法。“学会对于政治及社会，纯取学术研究，尚未有所主张。”①

这一特点在“少中”组织上的体现是“既无会长、理事名目，又不似各种团体有所谓首领、党魁、指挥党员为种种的活动”②。而只是成立了执行、评议、编辑三个部。执行部办理对内对外一切会务，主任为王光祈；评议部负责监督会务进行、选举各项职员、审查会员资格，主任为曾琦；编辑部负责审查学会丛书，出版《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月刊，主任为李大钊。

“少中”会员都是富有热情、朝气奋发的年轻人，他们之间素不相识者一见如故，推诚结纳。言行务求一致，尤其以虚伪、敷衍、放纵等恶习为戒。开会每有辩论，无不据理力争，面红耳赤，事后又握手言欢，不存芥蒂。在“少中”初期，大家不仅崇尚进取，共同探索，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己任，而且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劝善规过，有着很深的私谊。“少中”建立之初并非是纲纪严明，组织严密，服从某一领袖的政治团体。

“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的宗旨是“少中”这一特点的又一体现，并决定了兼容并包的指导思想。“少中”从1918年6月筹备发起至1921年7月，就青年的理想、人生观、妇女、宗教信仰等问题展开了广泛地讨论，畅所欲言，激扬文字。他们创办刊物，成立通讯社，组织学术讨论会，

① 《上海会员致北京会员》，见《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一期“会员通讯”。

② 《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见《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六期。

介绍各种新思想、新思潮，没有兼容并包的指导思想是很难做到这一切的。

为达创建“少年中国”之目的，它对会员资格限制极严，要求会员恪守“奋斗、实践、坚忍、俭朴”的信条。入会者必须具备：（1）纯洁，“凡思想龌龊、行为卑鄙之人，不适于本会所谓纯洁标准”；（2）奋斗，“奋斗有二义，学术上之奋斗；事业上之奋斗，本会认为凡能奋斗之人，无论其为学术或事业，将来皆必有成就。故本会取人以奋斗为标准”；（3）“对于本会表示充分同情”^①。以上三个条件皆具备者，再须有会员5人介绍，经评议部认可，始得加入。因此“少中”能集中遍布全国的青年中的优秀分子，成为当时青年运动的中心。

“少中”成立时，决定“与任何党派绝缘”，不“依赖已成势力”，不依靠过去人物^②。他们认为，中国现存的党派“不足以有为，过去人物又使人绝望”^③。代议政治成为军阀手中的玩物和统治的工具，议员有钱就卖身，为人民所不齿，地方分权变成了许多督军割据。“一切党系过去的历史，纷陈于吾人面前，令人触目惊心，不敢与他们携手。”^④为保持政治上的独立，“少中”坚持经济上独立，所有经费皆由会员自行捐助，并以创办报刊、编辑发行丛书等文化事业作为其经济支柱，不收受会外的捐款和资助，以免受外界的影响和牵制。

诚然，“少中”有为创建“少年中国”独立奋斗的良好愿

① 《本会征求会员之标准》，见《少年中国学会周年纪念册》。

② 参见《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一），第237页。

③ 《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三期。

④ 《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